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托洛茨基言论

(供内部参考)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托 洛 茨 基 言 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参加本书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宋洪训、纪涛、郑昇凡、周邦媛、杨穆、夏道源、蔡恺民、张海滨、王家华。

参加个别文章翻译的外单位同志有：俞翔辉、王燕春、张捷、汪昌仁、徐贤珊、白颜波、陈家宁、陆钟祥。

另有部分文章选自中文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俄国局势真相》、《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附录）、《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这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有的重新作了校订，有的作了个别文字修订。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托洛茨基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4 印张 838,000 字
1979 年 7 月第 1 版 197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书号 3002·201 定价(上下册) 3.80 元

(内部发行)

论 列 宁 (摘录)

· 编者按语 ·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列宁与世长辞了。

托洛茨基把列宁逝世看作是他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一贯地攻击他、诋毁他，列宁逝世后，他就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以“称颂”列宁的姿态，来破坏列宁的威信。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写了大量关于列宁生平的回忆录和文章，并把它们汇集成《论列宁》一书。

在这本书里，托洛茨基肆意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突出自己，破坏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威信。

例如，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不了解在苏维埃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日子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列宁是一个“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布朗基主义者。在托洛茨基笔下，列宁成了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问题的官吏，“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给人的印象是，列宁似乎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等等。

《论列宁》一书是臭名昭著的《十月的教训》一书的准备。

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的手法时指出，“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其“用心”就是企图“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6—307、301页）。

十 月 前 后

2. 变 革

在“民主会议”结束前，由于我们坚持的结果，确定了10月25日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当时，不仅工人住宅区，而且部队营房里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觉得最合适的是把卫戍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日期上来，正是这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来解决政权问题，而工人和部队应当预先作好准备来支持代表大会。我们的战略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我们向政权发起攻击，但在宣传上则强调敌人要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必须给他们以无情的反击。全部计划所依据的是强大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当时在各地都发展到几乎同样的水平，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最落后的团队至少也会对我们保持中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任何步骤都必定会保证我们立即取得决定性优势。但是，列宁担心敌人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调集小股具有坚决反革命情绪的军队先发制人。敌人如果乘我不备而取缔党和苏维埃，逮捕彼得堡的领导成员，那就会使运动失去领导，然后逐步予以削弱。列宁坚决主张：“不能等待，不能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9月底或10月初深夜在苏汉诺

夫家里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他决心力争通过一项不容怀疑、动摇、拖延、消极和等待的决议。但是，在抨击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们之前，他还对那些把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人施加压力。有人向他转述了我的话：“我们已经确定于10月25日起义。”我确实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来反对那些企图通过预备议会和通过立宪会议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办法来确定革命道路的人。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去夺取政权，布尔什维主义简直就该报废。那时就连立宪会议也很可能开不成。等到一切事情过去之后再在10月25日召开事先保证我们能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我们也就公开承担了不迟于10月25日夺取政权的义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日期挑剔得很厉害。他说，他对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代表大会还开得了吗？即使开得了，它又能做些什么呢？必须夺取政权，不应该把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把起义日期事先告诉敌人是可笑的和荒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10月25日也只能作为一种烟幕，但起义必须提前，不必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应当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才谈得上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立即着手行动！

在7月的日子里，列宁曾明确预料到“他们”会枪杀我们，而现在和那时一样，他又替敌人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得出结论说：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乘我们不备用武力袭击我们，使革命瓦解，然后各个击破。象在7月时一样，列宁过高估计了敌人的洞察力和决心，也许还过高估计了敌人的物质潜力。这种过高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目的是使党加倍地努力实行攻击。但党毕竟不能撇开苏维埃和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去夺取政权。这样做是错误的。它的后果甚至会影

响到工人的行动，并且可能在卫戍部队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困难。士兵们了解代表苏维埃，了解自己的士兵支部，他们是通过苏维埃了解党的。如果起义背着苏维埃，不与它联系起来，不借助于它的威望，使士兵看来起义不是直接和明显地从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结局出发的，那就会在卫戍部队中造成危险混乱。还不应忘记，在彼得堡除了地方苏维埃以外，还存在着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与这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抗衡。

结果，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三派：一部分人反对夺取政权，按形势的逻辑他们必然放弃“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要求立即组织起义，不指望苏维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需要把起义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使它在时间上同后者衔接起来。列宁坚持说：“无论如何，夺取政权必须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他们就会粉碎你们，你们将会任何代表大会也开不成。”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意思是说起义不应迟于10月15日举行。记得关于日期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大家都明白，日期仅是大致的，可以说是方向性的，根据事态发展，可以稍为提前或推后。但这里谈的仅仅是个日程而已。最必要的是期限，而且是最近的期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主要争论是沿着同一部分根本反对起义的人作斗争这条线进行的。我不想重复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就下列题目所作的那三四次发言：要不要夺取政权？是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夺取了政权，我们能不能保持政权？列宁在当时和稍后，用这些题目写了几本小册子和几篇文章。会上几次发言的思想自然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几次激烈而热情的即席发言的整个精神是很难转述和表达的，满篇都竭力用自己的意志、信心和勇气去感染反对者、动摇者和怀疑者。要知道，这是解决革命

运的问题！……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大家都感觉自己就象做完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部分与会者，包括我在内，后半夜都住在苏汉诺夫家里。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变进程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尝试导致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有可能利用苏维埃的威望使起义的准备工作合法化，并把它与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存亡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从上述这次中央会议到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我记得只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10月15日至20日。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兴趣，就是列宁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发言的“防御”性质采取的态度。我曾声明说，关于我们似乎准备在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日”）举行武装起义的传说完全是谣言，并提出警告，对任何进攻我们将给予坚决回击，直到最后胜利。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会见时的情绪比较平静和沉着，甚至我要说，不那么多疑。他不仅不反对我发言中貌似防御的语气，而且认为这种语气完全适合于麻痹敌人的警惕性。但他不时地摇头，并问：“他们会不会抢到我们前头？会不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证明说，以后的一切几乎都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在这次会见中，或在会见的某个时刻，好象斯大林同志也在场。不过，也可能我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了。总之应当说，对革命前几天的一些事情，在我记忆中象被压缩成团似的，很难把它们分开、拆散，并分别清理出来。

我和列宁的以后一次会见已经是在10月25日，在斯莫尔尼宫了。是在几点钟？完全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是从我们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就卫戍部队未来命运进行谈判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谈起的。报上报道说，谈判接近圆满结束。“你们妥协吗？”列宁带着逼人的目光质问说。我回答说，我

们故意在报上发表安抚人心的消息，这只是展开总攻时刻的一种军事计谋。“这样很——很好，”列宁兴高采烈，拖长着音节说，并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步，激动地搓着双手，“这一非一常一好！”伊里奇一般是喜欢军事计谋的。欺骗敌人，愚弄敌人——难道不是最开心的事吗？但在当时情况下，计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决定性行动的阶段。我开始报告说，军事行动进展神速，我们很快就拿下城内一系列重要据点。列宁看见了（也许是我给的）头天晚上印出的一张警告暴徒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如果他们趁着革命时机作恶，当予就地处决。我感觉，列宁起初好象在沉思，甚至在犹豫。但后来说：“对——对。”他如饥似渴地记下了这些起义的细节。对他说来，这些细节雄辩地证明：这一次事情确实在全速进展，决定性的关头已经度过，不会有反复和后退了。记得有一个消息给列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个消息说我曾书面命令抽调巴甫洛夫团的一个连来保障我们党和苏维埃报纸的出版。

“怎么样，连队出发了吗？”

“出发了。”

“报纸在排版吗？”

“在排版。”

列宁喜形于色，欢呼着，笑着，搓着双手。后来，他又开始沉默，想了一会儿说：“好，可以这样做。只是要夺取政权。”我明白，他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最后容许我们放弃用密谋夺取政权。他直到最后一小时还在担心敌人会乘我们不备而进行拦截和袭击。只是在10月25日晚上，他才算放了心，最后批准了事变走过的那条道路。我说“放了心”，——但这只是为了说明这里还有一系列与起义未来进程有关的各种具体细微的大小问题引起的不安：“听着，可不可这样做？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引起这样的后

果？”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和建议表面上互不联系，但都是从同一件紧张的立即就会影响到整个起义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

在革命事变中要善于不使自己受挫。当高潮不断掀起，起义力量自动增长，而反动势力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时候，最容易受事变自发进程的驱使。迅速取胜正如失败一样，会解除人们的武装。不要忽略事变的主要线索；在取得每次新的成功以后，都要对自己说：还什么都没有取得，还什么都没有保证；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的五分钟，正如展开武装行动之前的五分钟一样，应当具有同样的警惕性、毅力和决心；而在胜利以后的五分钟，在第一阵欢呼尚未停止以前，要对自己说：胜利尚无保障，必须分秒必争，——这就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行动方式和方法，这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和革命精神的本质。

*

*

*

我曾说过，有一次，唐恩大概是在去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派会议时，认出了化了装的列宁，当时他和我坐在一间过道房间里的小桌旁。这个情节甚至也被画成了画，不过，据我看，画得很不真实。但这是历史画的命运，而且也不仅是这一张。我记不清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在过了相当时日以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当记下这一点，否则，以后会被人搞错。”他诙谐地和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挥说：“反正一样，他们会没完没了撒谎的……”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列宁没有出席。他留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房子里。我记得，不知什么原因，房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后来有人在地板上铺了被子，上面放了两个枕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着休息。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叫我：“唐恩正在发言，需要给予回答。”我在略作答复以后，回来仍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在一起，他当然没

有睡意。哪里顾得上呢！每隔五至十分钟就有人从会议厅跑来报告那里发生的情况。此外，城里不断有人来报告消息：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率领下，已经包围冬宫，最后冲进去了。

这大概是在第二天早晨，离开过去的一天隔着一个不眠之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样子有点疲惫。他微笑着说：“从地下、动荡不安到掌握政权过渡得太突然了。Es schwindelt（头晕脑胀）。”——不知为什么，他用德语补充了这么一句，并用手在脑袋旁边做了一个旋转动作。这是我听到他就夺取政权所说的唯一的、多少属于个人的意见。这以后接着就是向日常工作平静过渡了。

3.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我们举行和平谈判是抱着推动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工人群众的希望的。为此就要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便给欧洲工人足够的时间来理解苏维埃革命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理解它的和平政策。在谈判第一次中断以后，列宁建议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屈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将军谈判的前景本身是很暗淡的，但正如列宁所说，“为了拖延谈判，就要有拖延的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就谈判的总方针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是否签字的问题，暂时推后，因为谈判如何进行，欧洲反映如何，会造成什么形势，都无法知道。而我们自然没有放弃对革命迅速发展所抱的希望。

我们不能再打仗，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我第一次穿过战壕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尽管事先接到通知并一再催促，但我们的同志对组织一次略微象样的抗议德国过分要求的示威，显然也已经无能为力，战壕里几乎空荡无人。谁也不敢说一句甚至有条件地继续战争的话。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此后不久，当我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的时候，我反复劝说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小组的代表发表一个“爱国主义的”演说来支持我们代表团。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能回战壕去，我们不会得到谅解，我们会失去任何影响”……可见，在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没有意见分歧。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德国人能不能打下去，他们能不能向宣布停战的革命进攻？怎样来了解和摸清德国士兵群众的情绪？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德国的一月罢工表明变动已经开始。但是变动的深度如何？是否需要试探一下，使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军队面临一次考验：一方面是宣布停战的工人革命，另一方面是三令五申要向这个革命发动进攻的霍亨索伦政府。

“当然，这很吸引人，”列宁反驳说，“毫无疑问，这样的考验不会没有结果。但是这很冒险，非常冒险。如果德国军国主义有足够力量（很有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那怎么办？不能冒险：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

最初，立宪会议的解散大大恶化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德国人开始一直担心我们会同“爱国主义的”立宪会议达成协议，这就可能导致继续进行战争的尝试。这样一种轻率的尝试会彻底断送革命和国家，但这一点只有后来才看得清楚，而这使德国人重新紧张起来。在德国人看来，立宪会议的解散意味着我们明显地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停止战争。屈尔曼的腔调立即变得蛮横起来。立宪会议的解散会给协约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什么印象呢？对此不难自己作出回答：协约国报刊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代理人。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正是在德军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解散“民主”立宪会议，以便与霍亨索伦签订奴役性和约。显然，协约国资产阶级会在工人群众中散布极大的混乱。而这又会促进

对我们的军事干涉。大家知道，甚至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已经被德国政府收买，目前正在布列斯特-里斯托夫斯克上演一出角色早已配好了的喜剧。这种谣传在法国和英国更是离奇。我认为，在签订和约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与德国当局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正是在这些考虑的影响下，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想出了一种“教学式的”表述，正式的说法就是：我们停止战争，但不签订和约。我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就写信告诉伊里奇。他答复说：回来再谈。顺便说一下，也许他在这次答复中已经表示不同意我的建议；我现在记不清这一点，我手头没有这封信，我也不能肯定，信是否还保留了下来。我回到斯莫尔尼宫以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这一切都很吸引人，要是霍夫曼将军无力调动他的军队来反对我们，那最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小。他能够从巴伐利亚突击兵团中精选出几个团的兵力，而反对我们难道需要很多兵力吗？你自己不是说，战壕里空荡无人。如果他终于恢复战争，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被迫签订和约，而那时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决打击关于我们与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的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有正确的一面，但这毕竟太冒险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要不惜一切保障革命的安全。”

除了这些主要困难以外，还有党内性质的严重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成员中间，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持不调和态度的人占支配地位。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谈判的消息加强了和激化了这种情绪。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情况自然使列宁深感不安。

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决定签署德国的条件，我们就要冒在党内引起分裂的危险。我们党也同欧洲工人一样，需要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同左派决裂，党就会严重右倾：要知道，所有那些采取战斗立场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各社会党结盟的同志，都无条件地拥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签订和约。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十月革命时期起过很大战斗作用的，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容争辩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但目前，问题关系到革命的命运。我们将恢复党内的平衡。但首先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签订和约才能拯救革命。宁愿分裂，也不能使革命遭受军事毁灭的危险。左派会大闹一通，然后，——甚至闹成分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回到党内来。要是德国人粉碎我们，我们谁也不能回来了……好吧，就假定接受了你的计划。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在此以后转入进攻，那时你怎么办？”

“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时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将看得清楚。”

“而你那时不坚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了？”

“决不。”

“照这样说来，这可能不是那么危险的试验。我们冒着丧失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爱沙尼亚的同志在我这里曾说过他们如何出色地在农业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牺牲社会主义的爱沙尼亚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列宁开玩笑说，“但是，为了良好的和平，大概不得不达成这种妥协。”

“如果立即签订和约，难道就能排除德国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吗？”

“就假定这样，不过那里只是一种可能，而这里几乎是必定的了。无论如何，我主张立即签字：这是上策。”

列宁对我的计划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德国重新发动进攻，我们就来不及签订和约了，就是说，德国军国主义不会为此给我们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说过：这只野兽奔跑得很快。在决定和约问题的历次会议上，列宁总是非常坚决地反对左派分子，而非常郑重和平静地反对我的建议。他勉强地容忍这个建议，是因为党显然反对签字，而对党来说，折中的决定应是通向签订和约的桥梁。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会议显然表明，刚从熊熊烈火的十月熔炉中出来的我们的党，需要用行动来经受国际形势的检验。如果没有折中的提法，多数人就会赞成革命战争。

这里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立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一点，也许是很有趣的。至少，斯皮里多诺娃最初是坚决拥护签订和约的，她说：“庄稼汉不要战争，他们会接受任何一种和约。”当我第一次从布列斯特回来时她对我说，“立即签订和约，并取消粮食垄断制。”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停止战争而不签订和约的折中提法，但把它作为通向革命战争的一个阶段——“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大家知道，德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声明的反应是，似乎德国不打算用恢复军事行动来作为回答。我们带着这个结论回到了莫斯科。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吗？”列宁问道。

我们两手一摊。

“似乎不象。”

“好吧，”列宁说，“如果这样，那就好了：外表保持不变，退出战争。”^①

然而，在期满前两天，我们接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

① 本章内所引用的对话自然都是大致的，但关于“外表”一词记得很清楚。——托洛茨基注

的电报通知：根据霍夫曼将军的声明，德国人认为从2月18日12时起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建议他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个接到这封电报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时在他办公室里。他正在同卡烈林和某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收到电报后，默不作声地把它递给我。我记得他的眼神使我立即感到：电报带来了重要的不祥的消息。列宁赶紧结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讨论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欺骗了我们。赢得了五天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放过。这么说，现在除了签订和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原来的条件。”

我提出异议，意思是要让霍夫曼转入实际的进攻。

“但是要知道，这就意味着放弃德文斯克，丢失许多大炮，等等。”

“当然，这意味着新的牺牲。但是，要使德国士兵实际上通过战斗进入苏维埃国土。一方面要让德国工人，另一方面也要让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知道这一点。”

“不，”列宁反驳说，“问题当然不在德文斯克，但是目前不能丧失一个小时。考验已经完毕。霍夫曼要想打仗，也能够打仗。不能拖延：这样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赢得了五天时间，这一点我是预料到的。而这只野兽是奔跑得很快的。”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发电报表示立即同意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应的电报发出去了。

“我觉得，”我在个别谈话中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在政治上是适宜的。”

“为什么？我们可不采用这些议会方法。”

“但是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政策上的急剧转变，从而使他们深信我们这次真要签订和遵守和约的决心。”

“也许，”列宁考虑了一下说，“这倒是个严肃的政治理由。”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接到德军在芬兰登陆和开始击溃芬兰工人的消息。记得我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情绪异常激动。在此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未见过他这样。

“是呀，”他说，“看来，非打不可了，虽然是赤手空拳。这一次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是列宁对芬兰革命被粉碎的电报的最初反应。但是过了十至十五分钟，当我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他说：

“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拯救革命的芬兰，而肯定会毁灭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帮助芬兰工人，但不能离开和约的基础。我不知道，这在目前是否能拯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还可能得救的唯一道路。”

而这条道路果然使我们得救了。

* * *

不签订和约的决定，绝不象现在人们有时写的那样，是从我们似乎与帝国主义根本不能达成协议的抽象考虑出发的。只要在奥弗相尼科夫同志的小册子中看一看列宁就这个问题提议的极有教益的表决，就会相信：拥护“不战不和”试探性提法的人对于我们革命政党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可以签订“可耻的”和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说过：即使霍亨索伦不敢或不能同我们作战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尽管要承担某种风险，也必须进行这种试验。

三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冒险，用刺刀试探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这一次是列宁倡议的。我们被击退了。这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情况有什么差别？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在冒险程度上却有差别。

记得拉狄克同志有一次写道：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